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笔谈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乡村建设

□ 毕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等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要求,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重要讲话中指出,要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是新时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对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美丽乡村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纵览历史,我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既面临着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又迎来了全面、广泛、深刻的生态文明建设变革,形成了以建成美丽中国为核心的全新治理目标。建设美丽中国,关键在于建设美丽乡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重大部署,要求“把乡村建设作为幸福美丽新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将农村美与农业强、农民富联系起来,充分显示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建设美丽乡村的坚定信念,对造福全体农民的坚强决心。因此,我们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绿色产业,优化村镇布局,改善安居条件,培育文明乡风,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美丽乡村。

保护生态环境。要建设美丽农村,必须以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为基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大自然中的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相互依存、联系紧密的生态系统,不仅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而且还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精神家园。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因素,我国农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不够,毁林开荒,围湖造田,过度垦殖,导致水土流失,旱涝灾害频发,盐碱化、荒漠化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使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因此,建设美丽乡村必须将保护生态环境放在首要位置,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科学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发展绿色经济。绿色产业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建设美丽乡村,并不是单纯追求田园风光之美,而是要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生产,保证农民持续增收,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立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探索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的新途径。通过建立以市场为导向、农民为主体、政府指导和社会参与的联动机制加快美丽乡村建设,鼓励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和资源条件,选择最适合本地发展的优势和特色产业,重点扶持和培育果蔬业、林茶业、竹木业、中药材业和特色养殖业等,并大力推进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和品牌建设。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进一步开发、整合乡村旅游资源,将文化展演、健身娱乐、民宿服务、农家餐饮与旅游观光结合起来,加快形成美丽乡村建设与农民增收致富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

优化村镇布局。针对目前农村普遍存在的村落零散分布、居民点多面广、宅基地闲置和“空心村”等现象,必须采用统筹城乡发展、优化村镇布局的途径加以解决。要根据气候条件、水文地理、自然资源、历史文化、民族传统、产业结构等实际,按照“高点规划、高水平设计、高标准建设”的要求,认真做好美丽乡村建设的规划设计工作。通过对村镇布局、生产布局、交通与水利布局的系统规划编排,科学划定城镇规划区、工业生

产区、农业发展区、农民居住区与生态保护区,统筹安排城乡建设、农田保护、产业集聚、生活居住与生态环境等空间结构,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形成“田成方、林成网、渠相连、路相通”的田园格局,以此来促进美丽乡村的建设发展。

改善安居条件。适度发展中小城镇,大力改善安居条件,打造新型农村社区,是建设美丽乡村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实施村组合并、异地搬迁、新建居民点等方式,引导农民从零星分散向环境优美、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的新型社区集中,并提供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此外,还要加强对古村落、古民居和古建筑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注重保留不同地域、民族、宗教的传统建筑与民居特色,实现历史与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把农村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家园。

培育文明乡风。文明乡风是维系乡愁的重要纽带,是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动力。培育文明乡风,有利于提高农村社会的文明程度,构建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关系,形成温馨、和谐、美好的农村村貌。我们要发挥文化育人重要作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引导农民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乡村文明新风尚,共同建设生态美好、社会和谐的美丽乡村。

(作者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社会建设改革与发展的中国经验

□ 宋学勤

改革开放作为一项深刻改变当代中国社会面貌的宏大历史变革,至今已走过40个年头。40年来,与改革开放进程相伴的社会建设成就卓著,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得到充分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雄心壮志,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势必在总结丰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成就,迈向新的高度。

改革开放是亿万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业,其成功得益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深刻把握40年来社会建设改革与发展的中国经验,对未来中国社会自身深化改革具有历史借鉴意义,同时,社会建设的中国经验也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社会建设指导思想的基本基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历来尊重人民作为主体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感情上贴近人民、在思想上尊重人民、在方法上求教于人民、在目标上服务于人民。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实践,更加印证了这条基本经验。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工作的最高标准。他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此后的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沿着这条正确路线,以此确立各个时期党和政府各方面工作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及社会治理工作迎来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在当选总书记的第一天就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表示“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的郑重承诺充分表达了我们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体现了人民在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充分表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立场,始终把尊重人民利益和意愿视为治国理政的出发点。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和民生领域的改革不断创新,力度空前,在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中地位更加凸显。近几年来,党和政府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多层次住房保障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与精准扶贫、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都迈出实质性的改革步伐。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提升了治理能力,顺应了民意。一些关乎人民切身利益的制度改革释放出红利,让人民体会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如: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序推进,使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落户者实现了最基本的权利;新医改向纵深,进一步扩大了保障范围,缓解了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极大地减轻了看病负担;旨在实现社会公平的社保与养老制度改革让企业职工的利益得到更充分保障;“二孩”政策的推行从根本上调整优化了当代中国的人口结构。这些措施夯实了亿万百姓对幸福生活的清晰预期。

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实践证明,只有把亿万人民的诉求真切地放在心上,党和国家的事业才真正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密,也是中国成功的秘密。

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社会建设突飞猛进的内在动力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制度创新是发展引擎,而人民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主体与制度创新主体。

制度创新是一个相对复杂且漫长的社会工程。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了的制度。”在40年的制度建设上,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和自下而上的人的首创精神在改革过程中缺一不可。改革中的“先行先试”,正是发挥人民首创精神,集

聚人民智慧和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的制度化,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生产经营体制的改革连带着既有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对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设定的改革目标是,“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不断推进制度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建设都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而制度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试点”。“试点”是到人民中去,接受人民的评价与检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创造潜力,蕴藏着促进社会进步的巨大热情和聪明才智。以“试点”来观察改革效果,然后由“点”到“面”铺开,是确保改革稳步推进的有效方式。中国区域众多,其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不同,改革基础差异较大,使得各项措施落实到地方难免“水土不服”。通过“试点”,找出各地“水土不服”的原因,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校正改革的步骤,让各项制度措施精细化,使改革事业在有序、稳定的轨道上行进。而且这种方式是把改革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与基层自下而上的人民首创精神积极地结合起来,集思广益,在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保证社会的稳定。这样的改革路线已成为制度创新的一条必经之路。

增进全体人民福祉:社会建设发展路向的适时调整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社会问题的变化,为社会建设寻求正确的方向;能够深入观察新时期民生问题,并及时顺应不断升级的民生要求,为社会建设树立正确的目标。

从中国国情出发不断地调整社会建设的改革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英明抉择。如教育事业发展,在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中地位更加凸显。近几年来,党和政府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多层次住房保障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与精准扶贫、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都迈出实质性的改革步伐。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提升了治理能力,顺应了民意。一些关乎人民切身利益的制度改革释放出红利,让人民体会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如: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序推进,使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落户者实现了最基本的权利;新医改向纵深,进一步扩大了保障范围,缓解了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极大地减轻了看病负担;旨在实现社会公平的社保与养老制度改革让企业职工的利益得到更充分保障;“二孩”政策的推行从根本上调整优化了当代中国的人口结构。这些措施夯实了亿万百姓对幸福生活的清晰预期。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以公平正义为主导的社会建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并在此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绝不能让一个领域落后,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不让任何一个区域落下,要让13亿中国人民共享全面小康的成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表明国家的发展战略将更加自觉地朝着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方向推进,并将走向更加平衡的发展之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给未来中国的发展划出了明确的路线图。全党全社会更要认真汲取改革开放40年来探索的成功经验,以制度建设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激发中国社会活力,增进全体人民福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为世界贡献更多更好的社会建设经验。(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拓展政府一线职员可行能力的路径

□ 朱昭霖

根据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发展目标为“人类可行能力”的扩展,也就是说,一切改革、发展都要以人的可行能力拓展为目标,即以提升个体从事其认为有价值的事物的自由为根本。可行能力理论经常用于分析贫困问题,同样也可以用来分析政府改革进程中的个体。在行政审批改革中,公众的可行能力拓展是“第一位”的,改革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提高企业、个人的可行能力,放宽自由发展行为的限制。而改革中政府一线职员的可行能力拓展同样重要,但因其“公仆”身份往往被改革所忽视。

关注政府一线职员的工作状态

让专业人士做专业的事,让最了解社会需求的人去提供公共服务,应当成为行政审批改革的重要原则。作为最了解社会需求、与社会“面对面”的政府一线职员,理应成为改革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实际观察发现,涉及审批的企业和个人,其改革“获得感”和办事“体验感”与政府一线职员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有直接关系。而实际上,行政审批服务过程中,任何问题都可以归因于人的问题。从这方面讲,考虑政府一线职员的可行能力拓展,关注其工作生活状态,与改革成效息息相关。根据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可行能力”的拓展,即让人们自由去做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因此,如何让政府一线职员认可面对面审批服务工作的价值,如何让改革循着给予政府一线职员自由思考、自由改善的方向推进,是拓展可行能力的核心。为此,从多维度理解可行能力,从过程层面关注政府职员“僵尸化”的人际差异性,从一线职员出发审视行政审批改革,意义重大。

重视政府一线职员可行能力的培养

不尊重政府一线职员在改革中的主体性、创造性,这种现象还是较为普遍的。一些问题虽然由于技术进步而掩盖,但并不代表忽视政府一线职员可行能力的问题不存在。不尊重政府一线职员可行能力的拓展,在行政审批改革中存在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作为政绩的改革目标→急功近利的改革指令→疲于奔命和丧失主动思考创新能力的政府一线职员→改革内生动力不足→进一步政治施压以推进改革→作为政绩的改革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作为最为重要的政府资源的一线职员,其被充分开发的仅仅是“一双手”,而不是“整个人”。压缩审批时间变成了各地政府新的政绩“锦标赛”,为了压低审批时间,一些地方打通部门隔阂、减少审批事项、缩短审批流程、一线职员工作标准化等方面推进自上而下改革,唯独

缺少激发自下而上的改革试错,忽视一线职员对工作的判断力、思考力,改革往往与社会需求难以匹配。比如,办事企业群众的改革“获得感”和办事“体验感”与压抑审批时间并不完全画等号,这种理念上的缺漏必须有准确理解公共需求的一线职员去弥补。再如,刚性降低审批时间的指令性标准忽视了管理的科学性,导致一些审批需求量大大的窗口与需求量较低的窗口“劳苦不均”,“繁忙的人没工夫反思,清闲的人没动力反思”,造成政府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拓展政府一线职员的可行能力

拓展政府一线职员的可行能力,首先必须对可行能力进行多维度理解,确定政府所能施力的维度。比如,在一线职员可行能力两大内容——功能(实际的生活状态或不同层面的生活水准)和能力中,能力方面更应受到政府组织关注,它反映了一线职员拥有实现各种功能组合的潜力以及拥有不同工作方式中做出选择的自由,即对于涉及自身工作的行政审批改革有较大、较自由的参与能力、影响能力。其次,在行政审批改革中,提升政府职员可行能力应重点关注技术和制度两方面,制度是重中之重。技术的革新将不断解放劳动力,制度的变迁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让一线职员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自由创造工作。这种相关的制度变迁包括:一线职员对涉及行政审批事务的具体改革决策的参与与制度;一线职员对涉及行政审批事务具体改革自由试错的激励与宽容制度;涉及行政审批事务的现代管理理念、知识、技能的培训制度;以及必要的惩戒纠错制度等等。再次,从整体宏观来看,我国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应从国家层面提出对政府一线职员可行能力拓展的重视,将“以政府一线职员为中心”与“以人民为中心”“以办事人中心”提到同一层面,让具体服务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均能享受改革红利。

总之,引入可行能力理论为的是寻找一个框架去客观描述政府职员在改革中的低存在感。在以人民为中心、以办事人中心的改革中,同样要以政府一线职员为中心,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补偿,使其在多元需求面前能够灵活进行公共服务供给。我们所谓的多元社会需求下的“多面型政府”,也正是以政府职员可行能力的不断拓展为基础的,拓展可行能力将培养更自由、更有创造性的政府职员,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而人性化的服务供给又是去标准化、去中心化、去模式化的,这就是“多面型政府”的根本气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



靠山

因迟到,湖南株洲育红小学一名三年级女孩,被何姓女教师罚站数分钟。女孩父亲,株洲渌口区派出所所长知情后,驱车直入学校,将何老师带走,并关入审讯室7小时。官方回应:情况属实,已经对副所长赵某做出停职的决定。株洲纪委派驻纪检组和株洲市公安局督察支队等相关部門正对此事作进一步调查,调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鸿斌 图

以制度和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 刘迎秋

高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主要驱动力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那么,怎样才能使创新成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涉及经济、社会、文化、企业、组织、管理以及制度和体制机制等创新。这些方面都很重要,但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及其对创新需求的紧迫性看,当前需要抓好的重中之重是两方面创新:一是生产及其技术的创新,二是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其中,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又是实现技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这是因为,制度和体制机制是人们参与经济事务、保证经济机体有效运转并发挥作用的各规程与准则的总和,是一个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模板与框架。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则就会一事无成。

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之所以能够大幅度提升,首要原因是我们对原来的经济制度和体制机制进行了深刻变革,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从而使懒惰的人变得勤奋、勤奋的人变得更加勤奋。没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长达4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任何试图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奇谈怪论,都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也是不利于经济主体开展创新活动的。其中的道理就是马克思早就指明的:在一定条

件下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影响甚至决定生产力发展。

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首先依赖于基础科学的发展、应用与创新,同时也依赖于具体生产技术本身的创新。国际经验特别是制造强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没有基础科学的发展、应用与创新,工业生产技术就难以提升和发展;但仅有基础科学的发展、应用与创新而没有整个制造业全过程的生产技术创新,特别是如果没有基础原材料生产技术创新,那么,最终产品直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是高质量的。为什么目前我国很多生产制造技术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相关制造业产品还达不到世界一流水平?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基础原材料还达不到世界一流水平,或者说,大部分基础原材料制品的技术含量还无法满足制造业、整个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必须大力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应用与创新,而且必须着力于生产技术的发展、应用与创新,同时还必须把生产技术的发展、应用与创新的着力点放在生产全过程的各个基础环节上。从我国制造业发展现状及其质量水平看,大力推动基础原材料生产与制造全过程的技术创新、全面提升我国基础原材料的生产制造质量水平,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总之,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着力于制度和体制机制创新,另一方面要着力于生产全过程特别是基础原材料生产与制造全过程的技术创新。只有把这两方面创新都做好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才有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